“序长不序爵”的校庆更自信

大学的文化和学术价值,就是要高于权力和财富的价值。假如官职成为大学校园的“通行证”,一切资源的配置皆以权力为主导,那么又何谈师道尊严?

评论员观察

□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

近日,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校方表示,接待校友采取“序长不序爵”的原则,只问入学先后,不论官位高低。舆论纷纷为这种打破世俗的“习惯”做法叫好,有人认为,这是高校“去衙门化”的一种大胆尝试。

校庆本应是一个感怀师恩、共叙友谊的契机。在这一天,天南海北的校友重回母校,重温年少时读书求学的记忆,体会一种单纯朴素的情感。但时下的校庆,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比拼排场、拉拢关系的平台。学校将位高权重的学生请回来隆重相待,仿佛唯有如此,才不至于辱没了自家的光鲜门楣;而得到礼遇的学生,也往往会投桃报李,为母校的生日送上一份厚礼。久而久之,校庆的职能在不觉之间被扭曲异化了。

校庆职能的异化,是趋炎附势的社会风气在教育界的投影,是学校行政化、利益化的一种体现。以官位高低、财力厚薄来给学生们排位,意味着学校价值观的失衡。这样的排位办法,会让身份普通的校友对母校产生距离感,更可能影响在校学生的价值判断,误导他们对权力和金钱的膜拜。

教育,最终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。爱因斯坦曾说:“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,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,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,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。”完善的教育不仅仅应当传递给学生以科学知识,更应该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。如果连学校都失去了独立自主的精神,而成为权力和金钱的附庸,那么在这样的氛围下培养出的学生,很难成为真正的栋梁之才。

学校固然不能脱离社会,但也不能因此混同社会流俗。学校应当具备丰沛的人文精神,高尚的道德操守。以强大的自信力,去抵抗社会上的不良风气,断不能人云亦云唯利是图。正如浙江大学原校长竺可桢所说:“乱世道德堕落,历史上均是,但大学犹如海上灯塔,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标准。”

因此,南京大学在110周年校庆的时刻,采取“序长不序爵”的原则,正是对“大学精神”的呼唤和彰显。这种做法,体现了一所百年名校的深厚积淀,当一些学校习惯以“得意门生”自我标榜的时候,南京大学能够冷静相对,正体现出了独有的坦诚和自信。这种自信源于学术的传承和思想的价值,而不是对权力的依附和对金钱的追逐。大学的文化和学术价值,就是要高于权力和财富的价值。假如官职成为大学校园的“通行证”,一切资源的配置皆以权力为主导,那么又何谈师道尊严?虽然南京大学的校庆观念只是应有的“回归”,如能长期坚持,却也有助于高校学术生态的改良。

我们更希望,这种“序长不序爵”的精神能够发扬光大,深入到教育的各个层面之中,让学校真正从权力的束缚下解脱出来,成为学生们追寻理想的净土,师长们维护师道庄严的圣坛。

>>个论

关注旅游“宰客”不应只盯着三亚

□朱永华

继三亚宰客事件之后,又有媒体报道,苏州游客丁先生一行去厦门,一顿饭就点了“五菜一汤”,结账时竟有近万元“天价”。

发生在今年春节的游客三亚“挨宰”事件可谓颇有些“戏剧性”,从一开始当地政府的“零投诉”回应遭到网友炮轰,后又说是“表述不当”的同时,声称要“对于恶意损坏三亚旅游形象的个人和单位,将采取法律措施追究其责任”。显然,三亚官方是想用泼水的办法来平息舆论,但事实上却成了浇油,直到三亚市委书记“低头道歉”,但曝光三亚“宰客门”的旧消息持续发酵的同时,更多的天价宰客不断被媒体爆出,三亚名副其实地陷入到这场“宰客门”的漩涡之中。

其实,笔者认为旅游景区“宰客”,远远不止于三亚一个景区,出门旅游过的人们都清楚,类似于这种宰客,在全国很多风景区都是“家常便饭”,就在“三亚宰客门”被爆的同时,少林寺、张家界、厦门等景区都有宰客见诸媒体。因此,我们关注“宰客门”,眼睛不能只盯着三亚,正像那位发微博的网友说的那样,“整死一两家店不是目的,整个旅游管理水平提升才是我所希望的。”我们也应该以此为契机,来关注我们整个旅游市场有序发展和繁荣。

利用旅游资源优势坐地宰客,不仅是目光短浅更是一种极不诚信,也是旅游业长期发展之大忌,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形容三亚旅游发展迅速有“成长的烦恼”这句话颇耐人寻味,实际上正是说明我们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,还不仅仅是三亚,更是我们很多旅游景区所存在的共同问题,关上三亚景区的“宰客门”并不难,当地也已经采取各种行动,但要让那些对游客投诉漠不关心,依然陶醉于“零投诉”里悠然自得,只顾赚钱,不顾管理的景区都把“宰客门”关上,还需要更广泛的舆论监督,把眼睛只盯着三亚而忽视整个旅游行业,不仅会造成按下葫芦浮起瓢,也不利于我们整个旅游行业的健康发展。

李华/画

“三好学生”的问题并非学生问题

□毛建国

近日,北京实验二小拟暂停评选三好生。校长李烈称,“三好生”的评选由来已久,从操作情况来看弊大于利,“三好学生”评选往往设置比例,这和教育方针相悖。近年来有教育界专家呼吁停止三好生评选,因为这一做法“过早给孩子贴上好坏标签”,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。(2月3日《广州日报》)

经过这么多年的常识洗礼,想不到现在还有很多人,特别是一些专家学者依然有着绝对化的思维。或许“三好学生”评选存在着种种问题,特别是存在着舆论一直诟病的“过早给孩子贴上好坏标签”问题,但“三好学生”评选难道就没有可取之处吗?

现在反对三好生评选的声音不小。著名生物学家、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就表示,“三好学生很难成为科学家,尤其是德智体各方面都是第一名的学生很难成为科学家。我倒觉得有一些脾气的学生很有机会。有个性的学生做研究的潜力较大,而八面玲珑的学生尽管讨人喜欢却常常在研究上坚持不下去。”看来真是术有专攻,施一公先生毕竟只是科学家而不是教育家。谁说学习好的学生就一定没有个性?或许第一名的学生很难成为最好的科学家,但现在各个领域有所建树的又有多少当初学习不好、各方面表现不好的?如果说,认为求学时表现不好就没有未来是一种片面的话,那么,认为求学时表现好反而没有未来,更是一种片面、狭隘、不正常的认识。

人的成长既需要动力,也需要压力。“三好生”评选对于那些表现突出的学生来说,就是一种动力;而对于那些表现一般化的学生来说,则是一种压力。现在认为三好生评选有不足,问题并不是产生在三好生身上,而主要是在评选的程序上。现在许多学校的三好生评选,已经成为一种利益交换工具,而且教育工作者也往往放大“某一好”忽视了真正的“三好”,这才导致三好生评选缺乏公正,失去了正向激励和反向鼓励作用。这只是在提醒我们,应该更加完善三好生的评选程序,让三好生评选发挥出更大更好作用,而不是要取消三好生评选。

或许三好生评选有一些问题无法容忍,但这也建立在寻找到替代的前提下。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,需要一些榜样力量引导,而从力量发挥的效果来看,越是贴近的越可师可亲可学,越能起到榜样作用。在找不到替代的情况下,拿什么树立榜样,拿什么激励学生、鼓励学生?

没有必要妖魔化三好生。当我们好不容易指出几个三好生成长的反面典型时,却不知道,在背后有更多的正面典型。只不过大量的正面典型,被人用一片树叶遮挡了。

>>声音

应当以农民工子女接受公立学校教育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切入点。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孩子同在一所学校上学,会增加他们与城市文化的接触和学习,孩子的家长们也会多一条与城市家长或城市文化沟通的桥梁。

——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张荆说。

中国学界的每一位成员,都希望能在研究上起引领作用,很少有人愿意充当协助角色。然而,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去领导,这就造成了导致浪费的重复和过剩。调查者用各种借口去购买同类型的设备器材,做着同类型的数据处理。

——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宫鹏说。

降低退休年龄很容易,但提高退休年龄却很难,对中国来说,提高退休年龄要有一个长期鼓动,取得共识的过程。制定提高退休年龄的时间表,不要一下子提高过多,小步渐进,国外也是这样,提高一岁要花好多年。

——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说。

孩子在日本上小学时,有一年寒假老师只布置了一项作业,就是回家在院子里或附近种一棵小树苗,然后每天浇水,并做好相应的树苗生长记录。这是多么有趣和富有创造力的作业。

——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陈永明教授说。

一般而言,社会很难做到绝对扁平化,社会分层是一种正常现象,这意味着社会中总会有一部分人相对处于上层。从社会稳定发展的角度出发,更好地发挥精英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,符合多数人的利益。

——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政策研究处处长曾博伟说。

思想的分化一定反映了社会的分化,而社会的分化最主要地表现在贫富分化上。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,权利和经济上也越来越不平等。知识分子为社会上哪一个群体说话,决定了他们的立场。所谓“屁股决定脑袋”,思想自然产生分化。

——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说。

■本版投稿信箱:
qilupinglun@sina.com

读者来信

改变择业观念

编辑:

你好!

看了2月5日《齐鲁晚报》报道的“80后大学生应聘女保安”,这位女大学生理性的选择,让我十分敬佩和赞成,同时也有一些话要说。目前,就业市场竞争激烈,尤其是结构失衡加剧供需矛盾,致使一些大学生择业困难,也是一个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。实际上并非市场上没有需求,而是一些旧观念阻碍了学生去适应不断变化的人力需求。许多学生顾虑多,怕吃苦,认为辛辛苦苦上了大学就是为了走仕途或找个一步到位高薪的岗位,这样既有面子又舒适,挣钱多,福利待遇又丰厚。实际上职业无贵贱之分,只是劳动方式不同罢了。一些大学生在为就业难焦虑之时,也当打破自己在观念上的局限。

读者 张颂华

这种“自发”最可贵

编辑:

你好!

看了《齐鲁晚报》2月3日《百余路人自发“拉纤”营救被困者》的报道后,深受感动。目前正是数九寒天,这几天气温又是极低,面对被撞坠河的轿车,面对困在车中岌岌可危的伤者,消防官兵不顾严寒跳进冰河,公安民警随后赶来帮忙,百余路人经过时也加入救援队伍,众人一起喊着口号,将车辆从河中拖出,将人员救出。笔者虽未参加营救,但仿佛看到了行人一个个加入救援的情景,仿佛听到了他们口中雄壮激昂的口号声,喊号时口里呼出的白气似乎就在眼前。

没有围观,没有视而不见,最可贵的是路人的“自发”,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“团结就是力量”、“众人同心,其利断金”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的真正含义。向他们致敬!

读者 鞠林强

补课的冲动

编辑:

你好!

《齐鲁晚报》2月5日报道,沈阳一中学为了组织补课,包车送学生跨市转移。这或许可以作为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在“禁补”上真抓实干,最终逼得那些不死心的中学想出了“跨市转移”的歪招。然而一批补课“地下党”的应运而生,也让我们担心是否会出现“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”的现象。其实,跨市尚属于小儿科,跨省的也早有耳闻。为何补课无所不用其极?原因很简单,虽然高考录取率在70%左右,但高录取率非但没有解决文凭之争,反而加剧了文凭的贬值。在就业机会没有质的提高的前提下,这无疑使文凭竞争白热化。这“分分分”依然是“学生的命根”。单纯的“禁补令”只能将假期补课逼到“地下”,逼到政策的死角去继续运行。其实,这个现象的根源众所周知,应试教育的大环境未有任何改变,高考、中考一张试卷定终身的考试模式不变,一些学校就会时不时地想突破“禁补令”,或者打擦边球。

读者 钱文

“杏林学院杯”读者报料大奖赛 96706 见报即有奖 最高2000元